

臺灣國樂創作之路的回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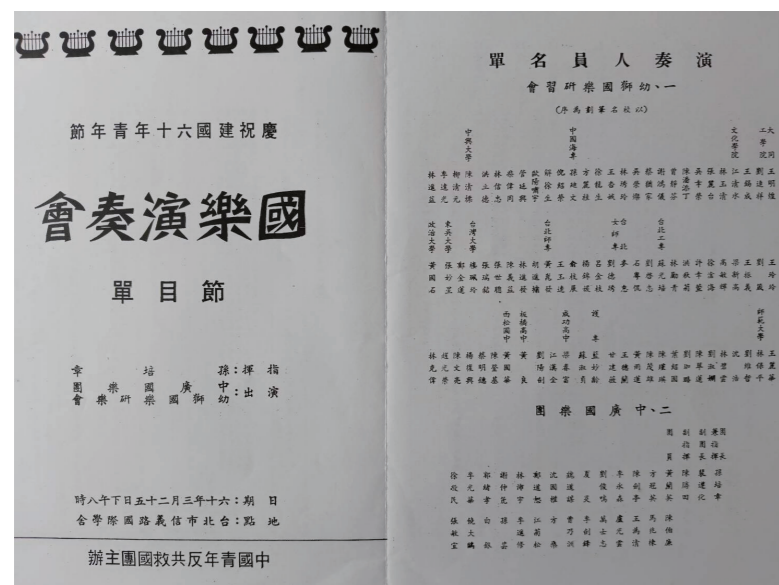
文 / 萬智懿

圖 / 萬智懿

作品是樂種的靈魂，尤其是像「現代國樂」這樣的新樂種，臺灣的現代國樂可說是本土作曲家賦予養分，由一首首的作品灌溉而成長、茁壯。「現代國樂」從20世紀發展至今，臺灣、大陸、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的作品，各自紛呈發展，在創作上已有明顯風格上的差異。本文礙於字數，僅以部分團體為例，重點式探討臺灣的國樂創作發展，並期望拋磚引玉，疏漏之處尚祈見諒。

中廣作曲室

臺灣現代國樂發展的鋪墊，要從1948年「南京中央廣播電臺」音樂組國樂隊來臺參加臺灣博覽會談起，這種類交響形式的國樂演出，在當時新穎且少見。隔年，隨著中華民國政府遷臺，部分南京中央廣播電臺的國樂家也隨行來臺，進入中國廣播公司組成國樂隊。藉著播音放送，細緻悠揚的樂聲傳播到全臺各個角落。由於中國廣播公司國樂團（簡稱中廣國樂團，下稱中廣）從重慶攜來的樂曲有限，「中廣」為了節目需求，從1956年開始附設「中廣作曲室」，特聘作曲專員¹，譜寫新曲、編配民謠、歌曲，錄播節目或演出之用。「中廣」的創作曲量有多少呢？從〈中廣國樂團三十年〉，國樂家楊秉忠接受崔菱專訪時曾說：「中廣演奏過的創作曲有千首」並自豪的說：「自己創作自己奏，份外起勁兒。」當時這種新興樂種的曲量，兩岸三地加上新、馬，皆甚為缺乏，而臺灣受政治環境的影響，長達38年（1949-1987）未開放兩岸交流，即便聽寫曲譜或自新馬港澳攜進大陸的樂譜，也不能公開演奏，因此有嚴重的曲荒問題，所以當時許多人對「中廣」有千曲之說，卻採封閉未流通的做法很不諒解。但畢竟中國廣播公司設「中廣作曲室」是爲了業務需求，無人有權將作品流通散布，而事實上「中廣」因設立「中廣作曲室」，間接推動了臺灣國樂創作的腳步，到1970年代爲止，流通於世的作品仍在百首以上，「中廣」仍是功不可沒。



1971.3.25 由救國團主辦、中廣國樂團協辦的幼獅國樂研習會，在臺北國際學舍舉行。大半的樂曲標題具有國族意識，其中的《蝴蝶操》爲首度發表，可視為青年國樂創作之濫觴。

¹ 周藍萍、楊秉忠、夏炎、林沛宇、劉俊鳴、呂泉生、黃莎、陳勝田、鄭思森等人，都先後擔任過中廣作曲專員。

國樂創作受政策影響

1967年，政府大力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短短數年，國樂社團迅速成長，而比賽也對創作有推波助瀾之效²，當時的國樂創作常受國家政策影響。例如中廣曾在1969年舉辦「愛國歌曲創作」徵求，1971年慶祝中華民國建國六十週年，特舉辦愛國歌曲比賽，同年中廣國樂團的演出，即出現不少與愛國主題相關的創作作品，如《中華頌》、《中華進行曲》、《恭祝總統連任歌》、《開國六十年》、《多難興邦》等具國族意識標題的樂曲，1970年代初期經常演出使用，並做爲救國團幼獅國樂研習會練習曲目，推廣給莘莘學子及社會大眾。

「中廣」的幼獅國樂研習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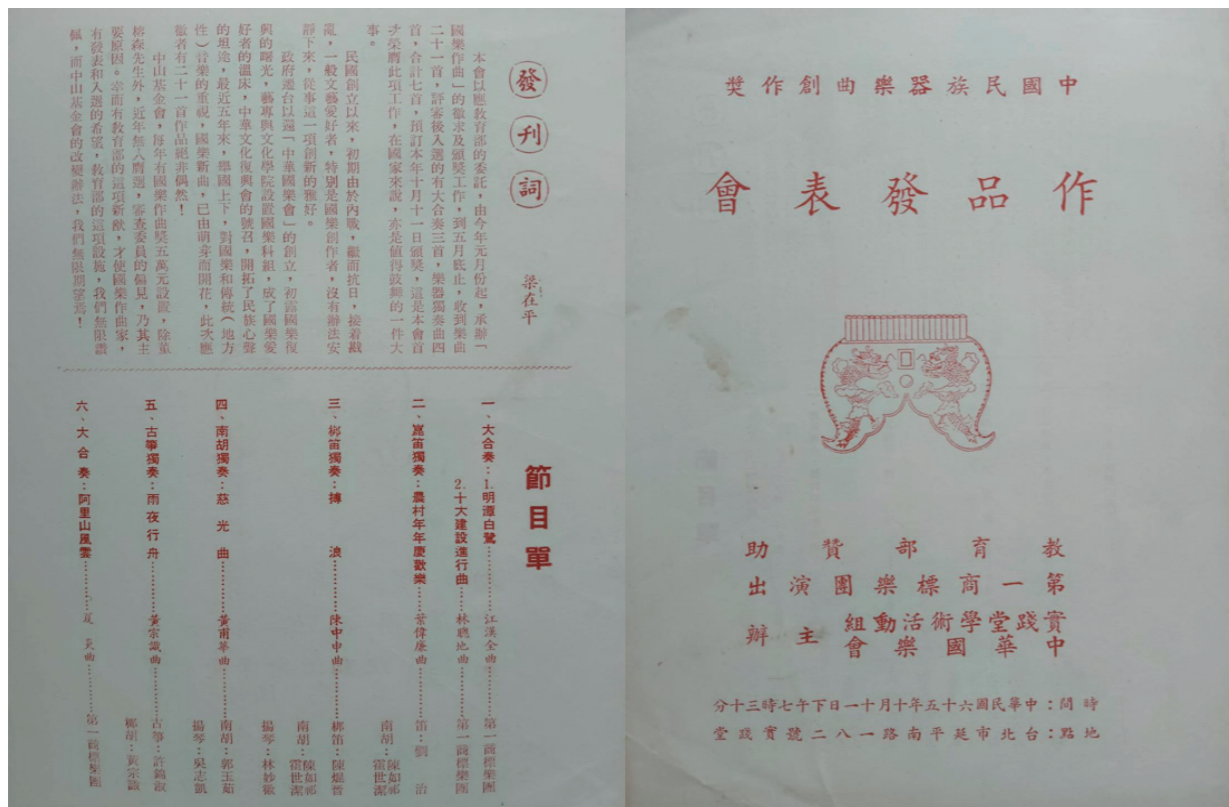
若說1960年代是國樂創作春雨後的萌芽期，1970年代可謂國樂創作生機勃勃的成長期。對國樂作品如飢如渴的青年們，受到鼓舞進行創作，如「大學樂團」（創作見表1）、參加幼獅國樂研習會的「作曲小組」，由國樂名家林沛宇先生、劉俊鳴先生指導嘗試創作新聲。這段時期出現許多優質的作品，如蔡錫山的揚琴獨奏曲《蝴蝶操》、施清介笛子獨奏曲《蹤影》、鄭德淵的古箏獨奏曲《淡江暮色》、林聰地的琵琶獨奏曲《海頌》及魏德棟的國樂合奏曲《柳營風光》。1972年劉俊鳴先生在接受「中國樂刊」採訪時即稱讚臺中師專已發展出作曲風氣，他表示：「以同學的熱情、才華、肯努力、下功夫，將來若能長期培養的話，對中國音樂必將有相當的貢獻。」劉俊鳴先生說的沒錯，不僅臺中師專，當時國立臺灣大學、屏東師專、成功大學、國立藝專諸多青年都爲國樂創作做出了貢獻。

（表一）大學樂團團員之創作

時間	活動名稱	創作樂曲
1972年2月22日	大學樂團第一次演奏會	王正平編曲：《採茶撲蝶》 羅永暉：《蠶》 陳鵬飛編曲：《詩篇》 周鳳丹：《郊遊》 史庭輝編曲：《恆春之歌》 史庭輝：《天祥夜籟》 陳端安編曲：《農村酒歌》 陳端安：《作品第二號「調音」》 劉宛然：《少年遊》 王正平：《深淵》
1972年7月28日	大學樂團第二次演奏會	王正平改編：《塞上曲》 陳端安改編：《臺灣農村組曲》
1972年12月23日	大學樂團第三次演奏會	顧豐毓：《春之歌》 周鳳丹：《笛語》
1974年7月29日	大學樂團第四次演奏會暨作品發表會	朱家炯改編：《揚州小調》 陳端安改編：《鳳陽花鼓》 周鳳丹：《笛語》 陳裕剛：《將進酒》 王正平：《兵車行》

演出地點：臺北實踐堂

² 例如陳勝田作曲的《昔日》，爲響應「毋忘在莒」運動，改爲同名樂曲《毋忘在莒》。



中華國樂會於1976年舉行首屆「中國民族器樂作曲獎」，上圖為該演出之節目冊。

教育部與中華民國國樂學會

在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下稱文建會）成立以前，文化仍屬國家教育體制的一環，一切的藝文組織活動均由教育部管理。1960到1970年代，文化藝術人才的培育與獎助，曾是當時的重要政策之一，國樂新曲創作的獎助即從此時開始。臺灣最早有「中山文藝創作獎」³，曾是臺灣具指標性的文藝獎項，董榕森先生在1968年曾以《普天同慶》獲得「國樂作曲」獎。此外成立於1974年的「國家文藝基金管理委員會」，1975年開始頒發「國家文藝獎」，國樂界首位獲此殊榮者，仍為董榕森先生，在1977年以《偉大的建設》嗶吶協奏曲獲獎。當時這兩個單位的獎項均審核嚴格，獲獎是藝文創作者的至高榮耀。不過此二獎獎金雖高，但是獎額很少，因此教育部又設立了「文藝創作獎」⁴，其中的國樂創作項目，委託中華國樂會⁵辦理（下稱國樂學會），當時稱為「中國民族器樂作曲獎」。因「中國民族器樂作曲獎」只是「文藝創作獎」諸多項目中之一項，因此亦可稱為「文藝創作獎」國樂新曲徵選。1976-1982年辦理之國樂新曲創作徵曲，共有68首⁶作品入選發表。教育部除支持「中國民族器樂作曲獎」活動，1981年還核准「國樂學會」辦理國樂合奏比賽指定曲創作及出版樂譜，並從1983年臺灣區音樂比賽正式使用，1983至1985年總共創作62首作品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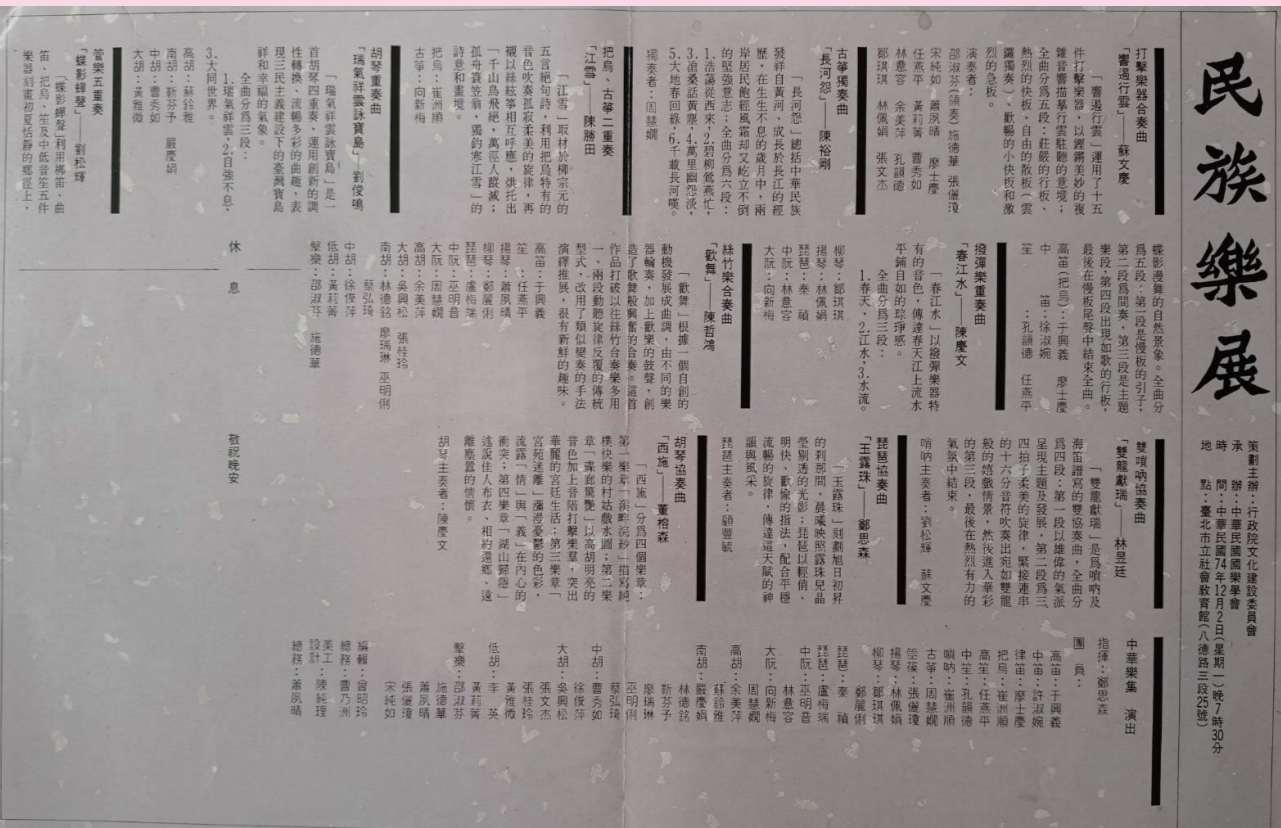
教育部自1981年起，將原本約10個項目分散各學會辦理徵選的「文藝創作獎」，統一委託由「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辦理。自此教育部「文藝創作獎」雖仍有鼓勵創作的功能與美意，但音樂類項目細分後，國樂項目未每年舉辦，得獎者亦減少許多，1999年以後不分中西樂，2006年開始將原本多元的音樂項目減為「音樂作曲」單一項目，2011年起至今已不見辦理音樂類項目比賽。或因如此「國樂學會」自2007年開始固定舉辦「國樂創作聯合發表會」⁸，據學者蔡秉衡教授統計，從2007至2023年「國樂創作聯合發表會」共發表創作166首，對培植國樂新生代作曲家及新曲創作，確實產生實質的效益。

³ 1965年設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1966年開始頒發「中山文藝創作獎」。
⁴ 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官網上的歷年得獎名單僅有1981年至今的成績公告。最初僅設「社會組」，2006年取消社會組，改設「教師組」與「學生組」，以鼓勵師生創作，2011年開始以文學創作為主。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1981年11月文建會（2012年改制為文化部）成立，統籌規劃國家文化建設及推動地方性文化發展，為藝文工作者和團體提供了許多獎勵與補助，1993年文建會將全國文藝季辦理方式下放地方，由各縣市文化中心舉辦文藝季、藝術節活動，1996年成立「國藝會」之後，許多國樂新曲的補助即來自於此。由於「國藝會」對國樂創作的補助不勝枚舉，就不一一細數。

梳理超過一甲子的現代國樂創作歷程，不難發現中廣國樂團、救國團、教育部、國樂學會、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文建會、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國立傳統藝術中心都對國樂新曲創作做出了貢獻。如今現代國樂已發展成當代藝術音樂之列，其進步不啻一日千里，除有領導者及政策的支持，背後前輩們的比肩迭跡不可計數，我輩等亦不可遺忘！



由文建會策劃主辦的民國74年文藝季「民族樂展」，有10位作曲家演出10首創作

⁵ 中華國樂會成立於民國42年4月19日，創會至今71載，對國樂的推廣面面俱到，可謂貢獻卓越。從第13屆開始（1974年），理監事異動較大，注入了不少新血輪，包括周文勇、董榕森、陳裕剛、郭長揚、許輪乾、陳建台、魏道謀等人。1982年11月7日經大會通過修改名稱為中華民國國樂學會。
⁶ 1976、1977年各7首，1978年因教育部經濟預算問題未能辦理，為鼓勵作曲，由中華國樂會國際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陳士孝先生提供4萬元獎金，成功舉辦第三屆的「中國民族器樂作曲獎」國樂新曲徵曲活動，名額也提高至14首，1979年20首，1981、1982年各10首，合計68首。
⁷ 教育部1983年委託創作「國樂合奏」指定曲12首，1984年「個人組」國樂器獨奏指定曲32首，1984年「國樂合奏」指定曲6首，1985年「國樂合奏」指定曲12首，共62首。
⁸ 「國樂創作聯合發表會」早在1988年即開先河，由蘇文慶先生擔任此場節目製作，新創的協奏作品有8首，連續兩天，分別在北、高兩地安排了二場演出，當時各大樂團菁英匯聚一堂協助演出，是國樂界難得的一場盛會。1989年有「國樂創作聯合發表會—名家奏名曲」創作9首作品，兩場共計17首樂曲。